

我们的家园——地球

——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

施里达斯·拉夫尔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我们的家园——地球

——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

施里达新·拉夫尔 著

夏瑟堡等 译

张博熙 校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3

(京)新登字 089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十章：脆弱的世界，空气与水，地球与火，恣意挥霍的富人，一无所有的穷人，人口的压力，一个封建的世界，生存的伦理，敷衍应付或更坏的前景，开明的变革。

本书全面分析了目前全球环境危机的现状，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危机的立场和认识，由于穷国和富国对这种环境危机贡献的不同及经济能力的巨大差异，从而对危机的认识也不相同，这就妨碍了双方的合作。作者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对策，特别从南北合作的角度，提出了应采取的行动建议。本书可供环境保护、资源、外交、经济贸易、计划、政策研究等部门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亦是大专院校师生有价值的参考书。

Our Country, The Planet
Forging a Partnership for Survival
Shridath Ramphal

我们的家园——地球

——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

施里达思·拉夫尔 著

夏望堡 等 译

张坤民 等 校

责任编辑 吴淑岱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区北岗子街8号

河北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3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1/4

印数 1 3000 (平) 字数 247 千字

1000 (精) ISBN 7-80093-420-2/X·756

定价：11.50 元 (平)

16.00 元 (精)

译校者的话

1991年8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第二次筹备会期间，在中国代表团招待 UNCED 主要负责人的一次午宴上，UNCED 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提出，当前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反映北方观点的著述很多，而反映南方观点的专著甚少。他正在请施里达斯·拉夫尔爵士写一本书，这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交部长和英联邦前秘书长，曾是研究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5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一向以代表南方观点而著称。斯特朗问，中国能不能翻译出版这本书？我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在团长陈光健和团员、国家环境保护局外办主任夏堃堡以及当时在 UNCED 秘书处任高级顾问的钱皓的支持下，当即答应了这个要求。回国后我向曲格平局长报告了此事，他欣然同意。

1992年3月，在纽约召开 UNCED 第4次筹备会期间，施里达斯·拉夫尔的新作《我们的家园——地球》英文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发式。会上，斯特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施里达斯爵士也坦陈他撰写本书的宏愿与思路。会议室内座无虚席。经钱皓介绍，爵士高兴地把亲笔签名的新作赠送给我，我也向他谈了中国准备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并希望在版权转让方面能给予方便，他慨然应允。

回国后，为了确保译书的质量，我们邀请了学界的几位高手，包括夏堃堡、魏翠苹、阮克洪、艾平、何吉贤和林文利等，分章翻译。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先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译完全书，夏堃堡和我又逐章仔细作了校阅。

钱皓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版权拥有者“美国，92生态基金会（ECOFUND'92）”

免费提供了版权并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在译校这本信息丰富、立论新颖的专著时，不时为施里达斯爵士丰富的学识、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观点所惊叹。愿本书的翻译出版能给关心环境、关心发展和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每一位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和坚定的信念。

张坤民

1993年6月1日

序 言

我们面对着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为了保持地球适于人类居住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正如前英联邦秘书长、圭亚那外交部长施里达斯·拉夫尔爵士在这本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中所阐明的那样，专家之间对于人类可生存性的核心问题的辩论已经得到解决。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并且能够证实：臭氧层的日益稀薄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将使世界文明处于危险之中，除非立即采取行动阻遏目前的污染行为。倘若缺乏世界范围的保护生物圈的有效计划，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得不生活在筑有穹庐的社区中，以防止紫外线的辐射，或者被迫居住在大堤后面（就象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以抵挡全球变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这些情景的出现并非不足置信。

科学界关于立即行动防御灾难的号召也扩展到了其他生态破坏的领域，敦促我们必须考虑人口压力对于日趋减少的地球资源的影响，地球表面四处蔓延的沙漠化以及对于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1991年，人类达到54亿之众；到2000年将会达到62.5亿。据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世界人口于22世纪中叶达到110.6亿时方能实现平衡。施里达斯爵士提醒我们：33亿公顷的土地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这对人类的饥饿和贫困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估计，倘若按目前森林砍伐的趋势继续下去，本世纪80年代中期生活在地球上的全部物种中的25%到2015年左右将会消失。面对这样的破坏趋势，我们不禁要问：现在是否已经为时太晚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人类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保护和恢复地球，这一现实的期望是否太迟了？我们是否已经造成了可能是无法逆转的致命性的趋势？

施里达斯爵士根据其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方面的 5 个国际委员会中任职的经验，以科学研究结果为基础，清楚地给我们勾画出了我们过度耗费资源的性质和范围及其内在的惊人的危险。他列举了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组织的专家们所设想的各种解决方案。他呼吁要在人们认识提高而发生变革的新时期中实施这些方案，这种变革将会随着各国首脑们于 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通过《地球宪章》而开始出现。但是，在各国并非甘心情愿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从国库中掏出钱来的情况下，这些耗资巨大的设想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吗？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的能源消耗给环境带来了最大的负担——会愿意接受一种较为节俭的生活方式吗？各国愿意为了明智的全球管理的利益而牺牲掉一点自身的利益吗？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各国政治领导人是否能够为了实施旨在保护地球及保证地球资源公平分配的长期计划而集中自己以及本国人民的意愿。施里达斯爵士告诉我们，如果要正视这一挑战，如果要完成我们对于后代的道德责任，那么就需要有一场人类意识的革命。

目前，寻找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需要的可行的计划，正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理论框架内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987 年提出来的。该委员会为可持续发展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已被接受成为 90 年代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指导原则。该委员会认为，如果世界各国毫不迟疑地在一个正确战略之下联合起来，这个战略延续到 2000 年直至以后，那么可持续发展是可以实现的。

施里达斯爵士是该委员会的一名主要成员。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以两个关键的组分为基础的：一是需要，特别是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要；二是环境限度，如果它被突破，特别是被世界上的富人所突破，必将影响自然界支持今日和明日的生命的能力。对施里达斯爵士来说，从广义上讲，富人是占世界人口 1/4 的北方

人民，大部分居住在工业化国家。他们消耗了世界商业能源的80%。其余3/4则是穷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中国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商业能源消费量的20%。能源消耗主要是燃烧矿物燃料，用于交通运输、居住和商业用途。由于它是全球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抑制的主要是北方。

施里达斯的著作不仅提出了抑制能源消耗的要求，它也向北方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呼吁：帮助南方摆脱贫困。英迪拉·甘地曾经将贫困称之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施里达斯支持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的论点：环境和世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除非北方参加实施双方互利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否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环境退化看来还将继续下去，以木材出口和发展农业为目的而进行的热带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森林是吸收和贮存对生物圈造成最大威胁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的宝库。森林也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主要贮存库。现在主要被工业化国家开发和利用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对于生态系统是极端重要的。

当北方呼吁发展中国家停止森林砍伐并采取其它生态限制措施时，南方回答道：你们的消费是造成今天我们共同面临环境危险的主要原因；你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积累的主要受益者，而这种发展造成了今天的危险；我们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无力同你们一道采取旨在防止长期性的全球危险的措施，如果这意味着要转移对我们人民当前基本需要极端重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话；那么，你们有责任在限制自身消费的同时，向我们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援助，帮我们摆脱贫困，并使我们的经济建立在有益于环境的基础上。

施里达斯爵士被许多人视为南方最权威的发言人。为了生态保护的利益，为了发展中世界日益倍增的亿万穷人摆脱难以想象的苦难，他呼吁北方要以巨大的规模救援南方。他提出了一个多边计划，该计划可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重建欧洲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相比拟。正被自身问题困扰着的北方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是迟疑不定。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南北结合、挑战和响应是促成联合国里约热内卢会议和推动正在进行着的谈判的动力。对话中心在于哪些项目应当置于优先位置和谁应当承担费用。坐在各个谈判桌边的大约 170 个国家的代表，比当时参加对世界环境初次警报作出响应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各个政府使团，无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而且在全球社会也有更大的代表性。这种状况反映了人们对地球所面临威胁的认识日益提高，这一认识推动各国政治领导人近年来采取了一些行动。我们有理由继续抱有希望。

1990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签字国一致同意 2000 年以前停止使用氯氟碳（CFCs）和其它主要的破坏臭氧的物质。自那以后，科学家们发现，臭氧耗竭情况超出早先预估的速度，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因皮肤癌而死亡。新的发现表明，在美国和其他温带国家，在紫外线最危险的夏季以及冬季和早春，臭氧保护层已经减弱。淘汰 CFCs、哈龙和其它耗竭臭氧的化学物质的行动即将加快。已经开发出了用于冷冻、空调、喷雾剂等领域的 CFCs 的替代品。同“臭氧行动”并驾齐驱，另一个拯救生物圈的行动也得到了支持。自 1988 年开始，在一系列由欧洲人牵头的科学和政府的会议上，全球变暖的问题第一次受到认真对待。由所谓“温室气体”组成的生物圈中的一个大气层保留了太阳辐射来的一部分热量，从而使地球保持恒温。主要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不幸的是，二氧化碳也是燃烧矿物燃料排放出来的主要污染物。70% 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工业化国家。由于它会加厚天然的温室气体层，这种排放使地球变暖，从而带来了气候变化的危险。这种变化将带来诸如海平面上升等灾难性的后果。全球变暖的一半是由于矿物燃料燃烧造成的。另外 1/4 是由 CFCs 排放造成的，森林砍伐造成了部分平衡的破坏。由于已有通过限制 CFCs 的排放而对臭氧层做长期修复的补救行动协议，国际社会最紧迫的问题集中在矿物燃料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上。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已经宣布，要在 90 年代稳定（若不是削减的话）其二氧化碳的产生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1 年最引人注目的落伍者正是在这一

方面最严重的污染者美国。美国由于使用矿物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 23%。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的排放量合计占 18%。七国集团之一的日本每单位产值使用的能源仅为美国的一半。美国在地球首脑会议筹备会议中孤家寡人地反对通过一项规定强制性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条约。欧共体和日本主张在 2000 年将排放量削减到 1990 年的水平。布什政府一方面笼统地接受国家科学院关于美国应该采取行动的建議，另一方面又主张，在进一步的研究使全球变暖威胁的各个方面更为清楚之前，应采取灵活的和自愿的节制措施。证据表明，布什政府这种政策背后的动机主要是对于严格的控制措施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担心，而不是对全球变暖科学预测的怀疑。为白宫政策辩护的美国官员们列举了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联邦和地方所采取的许多行动。由于《清洁空气法》、国会法定的能源效率和一些州规定的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控制，美国在今后 10 年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虽仍会增加，但将较为缓慢。如果反应堆开发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将会重新引起人们对清洁核能的兴趣。

联合国大会决定召开政府首脑级别的里约会议，表明了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登上了全球议程的最高位置。然而，在这种变革运动的背后，以及在施里达斯爵士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的求援的呐喊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峻的紧张关系。如果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工业化国家节制消费方面，里约会议不能产生出具体成果的话，那么，北南对话将会随之破裂。这次环发大会的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正是指挥过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人，他也是本书的发起者。他曾说，地球首脑会议提供了人类不可错过的机遇。若不抓住这个机遇，将会使人类需要的变革推迟 10 年至 20 年，甚至可能使它们成为泡影。

南方发言人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治上是否可行”的疑问。至少在 90 年代初期，西方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预算赤字、经济衰退以及东欧和前苏联新国家的紧急求援等问题。拟议中的《地球宪章》规定了指导国家之间、人民之间以

及人同地球之间关系的环境与发展的基本原则。一个行动日程——《21世纪议程》的目的是在所有影响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主要领域实施《宪章》的原则。该议程正在谈判之中。第一步的重点是在会议之后，即从1993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然后再扩展到21世纪。为了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南方正在寻求北方能在重大政策变革、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方面作出承诺。

无论本次会议的政治透明度多高，里约会议不可能完成全部要做的事情，这是十分明显的。在1991年7月的伦敦会议上，七国集团宣布：他们保证将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他们的声明中缺乏具体的内容，但这是一个征兆，它表明为了对付所有的挑战将是多么的艰难。在《地球宪章》上取得一致的背后，隐藏着北南双方艰难的讨价还价的前景。这种形势将延续多年。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工业国家在内的北方至少首先必须努力满足南方最低限度的资金要求，以维护北南合作。反过来，为保证有效地使用援助，北方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和民主，这种形势在动荡的第三世界并不总是存在的。

在北方国家中，只有日本看来能够提供相当多的额外的资金。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美国唯一可列为超级大国，但人们会说，美国银根甚紧，1992年的赤字高达2.6亿美元左右（原文如此，译者注）。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需要支付的“和平投资”亦必须兑现。在欧共体内，只有德国有钱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额外的外援，但波恩已为复苏前东德和东欧的经济和环境的巨大计划作出了承诺。四分五裂的前苏联在其政治和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已成残废，肩负高达680亿美元左右的外债，它已不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国家，而是争取外援的竞争者。诸如威海的污染和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后遗症等本身的环境问题，需要人们关注并提供资金，但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挑战，这些经济方面的论点不能作为全面的回答。

日本已经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世界领导者面目出现，它表示有兴趣在环境领域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它将逐步提供相

当数额的援助。一些日本公司，如一些在美国的多国公司正越来越积极地在诸如资源回收和再循环、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及污染控制等领域寻找商业机会。日本的捐款数额将是相当大的，但尚不足以满足上述巨大的需求。唯一的出路是北方采取多边的方式。

除了大量的资金注入以外，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日本在免除债务、贸易和技术援助等领域也能提供相当大的援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关贸总协定也由他们支配。债务一直拖着第三世界发展的后腿，其中一半以上是欠私人银行的债务。近几年来，每年向债主偿还大约 1250 亿美元的债款，这超过了援助的注入量。减轻债务负担的步骤正置于优先的地位。工业化国家更严格地加强对私人机构的管理也是有益的，不然这些私人机构将吞食从南方流出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外流很大部分是用以支付军事开支，每年大约 1500 亿美元。主要的军火供应者前苏联和西方国家联合行动减少军火销售，可能使迫切需要的一些资金转移到经济发展方面。

在今后数年内北方的反应会表现出有所进步，但它会超过施里达斯爵士所说的“敷衍应付”的状况吗？“敷衍应付”是他对富国作出下列特殊反应所作的描绘：意愿良好，但往往行动有限，对危机想要控制却不是事先避免。这与他那富有远见卓识的“开明的变革”方案相距甚远。根据他的方案，北方将接受人类共同生存的需要这个原则，并为全球规模消除贫困和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长征提供资金。按《21 世纪议程》这样一项计划，预计的费用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每年约需 1250 亿美元。这与现在第三世界每年偿付给北方的债务数额大致相同。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节能、免除第三世界的债务、稳定人口、保护农田表土层、减少沙漠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开始踏上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的道路之前，尽管日本和欧共体的经济实力正在日益增长，北方仍然期待着美国来牵头。在 1992 年的情况下，想要美国在承担这样一个环境规划的费用中，超过其有限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美国已经被冷战的开支所削弱，

预算赤字使它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又面临着城市的衰退和 13% 人口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不想停止其经济发展，或者要它的人民作出新的长期的财政牺牲。在能源消费中广泛征收碳排放税以减少污染和为环境项目提供资金的建议，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看来难以接受。美国宁愿危害其环境和贸易平衡，仍然顽固地坚持汽油低税政策。

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的话，只有说服美国人，使其相信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采取行动，以防止由于北方没有联合行动而出现的环境灾难。

西摩·托平 (Seymour Topping)

美国报纸编辑学会主席

前 言

献上本书，谨表我对无数促使本书得以问世的人们的谢忱。我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提及了其中许多人的名字，但对我来说，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①。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地球这个家园的全貌，具有认识我们正在危害自身生存之地的智慧，还具备为了全人类而保护地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锲而不舍地说服我们这个自信的社会“亡羊补牢”采取行动的决心。在这些人当中，有关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人口学家、未来学家、记者和许多其他职业的人，包括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的远见、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榜样以及他们的热情表示感谢。我写这本书，仅以我微薄之力，将他们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使命继续下去，除此之外，别无它求。

莫里斯·斯特朗邀请我写一本关于地球首脑会议议程上诸问题的书。该书既是根据我多种经历写出的个人的声明，也是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看法的世界的观点。受此邀请我受宠若惊，面对此使命也有惶恐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撰写本书既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也是一种俯首听命的经历。为此，我对斯特朗十分感激。我希望，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他为地球首脑会议取得成功而从事的伟大事业有所裨益。但我始终清楚地意识到，1992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只是今后长途跋涉的补给站。因此，我将它看成是今后将继续下去的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也希望本书对这个更长远的过程能够作出贡献。

我曾特别有幸担任了80年代建立的，对待目前人类生存问题

① 沃德和杜博斯是《只有一个地球》一书的主编。

日程上主要议题的5个独立的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国际发展、安全、环境与发展、人道主义问题，以及南方问题的委员会。我特别要感谢与我在这些委员会一起工作的人士，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dt）、已故的奥洛夫·帕姆（Olof Palme）、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约旦王储萨特罗丁·艾加·汗（Sadrudin Aga Khan）和朱利叶斯·纳艾利（Julius Nyerere），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们、委员会的委员们。虽然我所写的这些并不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倘若我未能得益于这些共同的经历，那么我在撰写这本书时所能提供的思想和材料将会少得多。

我也感到有负于我的家人以及其他人数众多而难以一一列举姓名的人。他们对我全力投入本书撰写提供了帮助、支持和忍耐，对于他们所有忠实而又宝贵的支持，我深表感激。但其中有一些人，我仍必须提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直接参与才使本书得以问世。在技术方面，马丁·霍德盖特（Martin Holdgate）和霍华德·欧文（Howard Irwin）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了详尽的意见。文森特·凯布尔（Vincent Cable）、赫塔杜（Maria—Elena Hurtado）、克莱夫·乔丹（Clive Jordan）、拉吉·拉夫尔（Raj Ramphal）和斯瓦米纳桑（M. S. Swaminathan）也从不同角度做了相同的工作。此外，文森特·凯布尔、赫塔杜、马丁·英斯（Martin Ince）、霍华德·欧文和比什诺特·帕索得（Bishnodat Persaud）特别帮助我撰写了某些特定的章节。他们这些以个人名义作出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每个人都贡献了质量独特和价值巨大的经验和观点，本书中的精华部分应当归功于他们。也可能会有人不同意我写的某些方面，我必须说明，他们不必为本书的内容负责。

我要向我的秘书伯尔尼·李达莉（Bernie Lee—Dare）表示特别的谢意，感谢她的全心全意的工作、旺盛的精力、耐心和技巧，是她帮助我把我的手稿和草稿变成可以工作的文件，并最终成为可供出版的书稿。她的平稳的双手和安详的信心是完成本书的关键。保尔·古德温（Paul Goodwin）负责帮助核对了似乎是无穷无

尽的数据。乔治·哈里斯 (George Harris) 负责在各阶段将书稿复制和装订。我对他们坚持不懈的工作表示感谢。埃尔莎·曼塞尔 (Elsa Mansell)、珍妮特·辛夫 (Janet Singh) 和我在伦敦的后援小组提供了基本的行政支持，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得到成功。

然而，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查尔斯·古那瓦迪那 (Charles Gunawardena)，他自始至终为了这本书同我在一起工作。他为本书贡献了其超群的编辑技巧以及他的丰富的智慧和观察力。他那同其才能相当的指导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不会希望将他排除到工作成果应负责任以外，这是他的性格，也表明了他是如何密切地参与了本书的工作。

最后，倘若没有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及生态基金 '92 (ECOFUND'92) 慷慨提供的财政支持，以及他们和其他机构的广泛鼓励，本书的问世也是不可能的。我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对这种支持表示感谢。

谨将此书献给巴巴拉·沃德 (Barbara Ward) 和
雷内·杜博斯 (René Dubos) 以及所有为了我们的家园
——地球而继承他们事业的人们